

編後語

本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季衛東、劉擎、郭建、徐賁四篇文章以及貝十川的長篇書評，剖析「施密特熱」在西方和中國的內涵，及其在當今中國思想論爭中的定位。

一百多年來，中華民族求變的社會實踐歷史中，始終伴隨着如何把握變革方向的思想爭論；而知識界也一直在急切地從傳統、或者更多地從西方汲取資源。施密特無疑屬於「外來和尚」行列，或許還可以說是其中最新、最刺激的一種。姑且不論施密特與納粹德國之間的政治糾纏，我們有興趣的是，為甚麼這位具有「深重的危機感、熱烈的拯救意識及智性上的極端自負」等特徵的富有爭議的德國思想家，他從德國歷史和現實感出發、以政治神學為背景構建的憲法學和政治理論，在二戰後一度沉寂了，而近三十年又在西方火熱起來，同時受到左、右翼知識份子的重視？為甚麼在二十一世紀之初，施密特會在中國知識界熱了起來？也姑且不論，是否如有的作者擔心和警覺的那樣，在當下中國語境中，施密特的理論有可能成為幫助壓制自由、曲解民主、阻礙憲政和助長專制的利器，我們認為，圍繞施密特的這些討論，提出了一系列對現代性、自由主義，以及對中國未來政治發展不容迴避、意義深遠的理論問題，例如，民主制度的基礎是抽象的人民抑或是個人權利？政治成熟民族的意志如何得到宣示、實現？面對現代社會多元的、甚至相互衝突的價值體系，政治認同何以實現？在現代，政治的正當性如何確立？其道德基礎為何？為了促使這一討論能夠深入地持續下去，我們特別期待和歡迎學者在本刊發表不同意見。

上述有關施密特熱的討論涉及到政治認同的西方理論資源，而本期「百年中國與世界」三篇文章，則是從近代中國思想史層面探究國家認同觀念的發生和演變問題。金觀濤、劉青峰運用觀念分析與數據庫相結合的方法，揭示晚清1860到1895年間，萬國觀的興起和實踐，及其與傳統天下觀的差別；這是以往中國民族主義起源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環節。立足於晚清中西之間有關地理與歷史知識的溝通，章清討論了當時「天下萬國」與「普遍歷史」理念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，及其如何受到知識資源背景的制約。高力克則探討陳獨秀國家觀念的變化及內在邏輯，及其如何處理自我認同、民族認同和人類認同之間的緊張關係。實際上，怎樣才能消除在認同問題上這三個層次的內在緊張，這不僅是歷史上，也是今天中國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困境。林同奇對本刊2005年8月號發表的葛兆光〈重建「中國」的歷史論述〉的長篇回應文章中，介紹了史華慈對中國民族主義問題的重要論述，是很有啟發性的。

此外，日本馬場公彥從書籍出版角度分析戰後日本亞洲意識的演變，韓國白永瑞回顧近代以來中韓兩國相互認識的演變軌迹，提出如何把握東亞近代歷史記憶的多重性，以及德國王馬克談中日韓三國應該互相認識、尊重鄰國的歷史，三篇文章顯示出一個共同的良好願望：在這個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意識高漲的時代，如何把具有巨大凝聚力和破壞力的民族主義，控制在史華慈所謂的「良性的文化民族主義」之內，是我們要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。